

# 红色政权的第一个“招贤令”

□苏春生 杨醒国 廖九平

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征求专门技术人才启事》,明确提出要以现金聘请技术人才。“凡白色区域的医师、无线电人才、军事技术人员同情于苏维埃革命而愿意来者,请向各地共产党组织及革命群众团体接洽,并填写履历,转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内务人民委员会,即可答复并谈判条件,于订立合同后,护送入苏区。”

这则“招贤令”仅130余字,言简意赅、指向明确,生动折射出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招才、引才、育才、聚才的坚定决心和战略远见。这是红色政权公开颁布实施的第一个“招贤令”,它见证和讲述着党管人才工作在中央苏区的探索和实践。

## 为什么要发布“招贤令”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新生的红色政权从诞生之初就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政府残酷的军事“围剿”与严密的经济封锁。在这种极端艰难的环境中,中央苏区不仅要坚持武装斗争,还要进行经济建设,发展工农业生产、医疗卫生、军工通信等各项事业。但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基础薄弱,劳苦民众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专业技术人才的极度匮乏成为制约中央苏区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瓶颈。

1930年9月,瑞金县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就已明确提出要“养成在革命环境中所需要的革命工作的干部人才”。随着反“围剿”斗争的深入,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前夕,中央进一步意识到,单靠中央苏区内部培养难以满足急剧增长的人才需求。1933年10月,中央苏区文化教育建设大会指出,教育缺乏“服从于战争”的意识。同

年11月,《中央关于开展反对五次“围剿”运动的紧急通知》明确要求,要大量征调“工人,失业工人,革命学生,智识劳动者,医生,工程师,技师,专门家等”进入中央苏区服务。

由此可见,发布“招贤令”的直接动因,是战争与建设的双重压力。中央苏区急需医疗、通信、军工、农业等领域的专业人才,以支撑前线作战与后方发展。而当时苏区内人才储备不足,尤其是高技术领域亟需从外部引进。这一举措,也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技术与革命结合”的远见卓识,尝试以人才引进打破封锁、增强实力,应对战争与建设的需要。

## 各方人才涌入中央苏区

尽管面临国民党严密封锁与交通阻隔,这则“招贤令”仍取得了重要成效,吸引了一批来自白区、旧军队乃至海外支持革命的技术人员进入苏区。

早在1929年6月,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提到红军急需医生、造炸弹师等技术人员,请求中央派人支援。1931年初,中共中央选派贺诚、彭真、陈志方等医疗卫生人才骨干前往中央苏区。1933年春,曾在德国学习工业技术的兵工专家刘鼎奉命进入中央苏区,成为军工建设的重要骨干。这些由中央直接选派或从海外归来的专业技术人员,政治可靠、技术过硬,成为中央苏区科技事业的奠基者。

1933年发布的《征求专门技术人才启事》明确表示,可通过各地共产党组织或群众团体接洽人才。这一政策吸引了一批技术人员。例如傅连璋,原汀州福音医院院长,携全部医院设备与家产迁往瑞金,成为“苏区第一个模范”;戴济民,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原在吉安开设私人诊所,经红军争取后携带全部药品与医疗器

械加入红军;韩日升、刘广臣、郝希英等奉天兵工厂技术工人,于1932年被选派进入中央苏区兵工厂工作。

同时,红军还注重对国民党军队中起义与被俘人员的转化。例如王诤、刘寅、李治等人在龙冈战斗后脱离国民党军队,加入红军,成为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奠基人;军医陈义厚在宁都起义后加入红军并入党。1932年4月漳州战役后,红军动员了原国民党军修械厂的二十多名技术战俘加入官田兵工厂。这些人员经过思想改造与技术整合,逐渐成为中央苏区科技工作的骨干力量。

据统计,至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前,中央苏区累计引进了数百名专业技术人员,涵盖医疗、通信、军工、农业等多个领域。虽然总体数量有限,但在当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已属不易。

来自五湖四海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一经融入中央苏区的革命洪流,便迅速在军事斗争、经济建设、医疗卫生、通信联络等各个关键领域展现出巨大能量,发挥了先锋队、突击手、排头兵的作用。中央苏区先后创立了无线电学校、军医学校等专业技术学校,不仅培养了一批本土技术骨干,也初步形成了“教育—实践—服务”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 “党管人才”的初始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就高度重视人才的政治引领与生活保障,体现出对人才的充分尊重与信任,并初步构建了“党管人才”的工作框架雏形。

在政治上充分信任与重用人才。1933年10月召开的苏区教育大会上,少共中央局书记凯丰代表苏维埃中央政府宣布:“苏维埃政府是工人和农民政府,他吸引一切愿意为苏维埃服务的‘人才’,旧的教员,专门家,旧的知识分子以及各种的自由职业家工

作,只有苏维埃政府,才是真正爱护人才的政府。”

在物质与精神上充分激励与优待人才。中央苏区在异常艰难条件下,仍尽力为人才提供物质与精神上的保障。1934年2月颁布的《小学教员优待条例》,将教员在生活费、帮助耕田、减纳土地税、看病等项待遇提升至与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同等水平。1934年6月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关于军工人待遇的命令》规定,各军事工业工厂的工人,除本人得享受红军各种优待外,“由白区来的(特别是专门技术人才),应予以相当津贴,以便供给其在白区的家属的生活”。参加宁都起义后到红军学校任教员的吴子罕,因教学水平高、工作积极,学校特给予每月50元津贴。他深受感动,坚决请求免除给他津贴,以支援革命战争。但学校只同意减发三分之一。后来他一再请求免发,学校只准再减三分之一,以示对其贡献的认可。这些措施虽简单,却充分体现了党对人才的重视,为“党管人才”积累了初始经验。

在组织上充分保障与培养人才。中央苏区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专业技术管理部门和领导机构,如总卫生部、卫生研究会等,为科技人才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同时,通过设立各类专业技术学校和研究机构,系统培养和任用人才,初步形成“政治引领、技术培养、组织保障”三位一体的人才工作模式。

红色政权的第一个“招贤令”,是中国共产党在极其困难条件下开展人才工作的开创性实践。中央苏区的人才工作告诉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与政治引领;推动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打破地域与出身界限广泛吸纳人才;通过制度建设保障队伍稳定。这些原则与举措不仅有力支撑了中央苏区的生存与发展,也为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才工作提供了经验和初始样本。

回望红色金融的源头,我们清晰地看到一位关键人物——毛泽民。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以坚定的信念为红色金融事业夯实根基,以廉洁的操守守护革命的经济命脉。追溯这段历史,正是为了寻找红色金融的精神密码,汲取继续前行的力量。

## 白手起家的奇迹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极端困难条件下,扩大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加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金融作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段岁月里顽强而茁壮地成长起来。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筹建国家银行,并指定由毛泽民负责。面对金融人才严重缺乏、没有准备金、苏区内多种货币混流通等重重困难,毛泽民迎难而上。

他深入调查苏区财政金融状况,很快将财政部库存的20万元现金、库房及管理人員全部接收过来,成立了国家银行金库。靠着这20万元,苏维埃国家银行开始了艰难起步。

当时,银行仅有5名员工,办公场所是借用的一家农民的房子。楼上楼下共有一个小厅和四个房间。楼下小厅作营业室,一个房间作库房,楼上三个房间,一间是毛泽民的办公室兼卧室,另外两间和房外走廊是工作人员的宿舍。

## 另辟蹊径的智慧

毛泽民深知自己从前的财会经验不足以建立系统、完善的银行制度体系。在无法延请专家,也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他另辟蹊径,要求银行工作人员深入红军各部队,号召战士们清理战利品时,将有关经济的表格、书籍、用具等一律收回,然后集中进行研究。

有一次,前线部队送来一批缴获的现洋,经手人员发现现洋的包封纸竟然是国民党税务机关的四联单。毛泽民如获至宝,赶紧召集大家对四联单仔细分析研究,对金库的管理制度和流程加以改进,使金库资金的收款方(国家金库)、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相应的记录,使财务制度更规范和严谨。

仅用了几个月时间,毛泽民就整理总结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国家银行往来存款暂行规则》《银行汇兑规则》等一系列规章制度,规范了国家银行的运营管理。

## 货币战场上的防线

面对当时苏区货币品种繁杂、行市差价不一和白区派遣特务套购根据地物资、侵蚀货币市场的混乱局面,毛泽民决心统一货币,重建苏区货币金融体系。

统一货币的前提就是尽快印刷出纸币。在去上海、香港影制钞版、购置印制材料未果之后,毛泽民决计自己动手造纸。没有造纸原料,他就号召大家捡些烂麻袋、破棉絮,上山砍毛竹、剥树皮,收集鞋底、绳头。捡回来的东西全部砸碎后在石灰池中浸泡,然后捣成纸浆用于造纸。

在大家的努力下,终于在1932年7月7日印制出了第一批统一纸币。1932年,中央造币厂成立。有了统一的货币,毛泽民会同苏区财政部门宣布一切交易和纳税均按新发行的苏维埃国币计算,白区纸币禁止流通。国家银行一举扫除了昔日货币市场混乱的局面。

1933年,由于国民党加紧了经济封锁,使得苏区物资匮乏,物价上涨,纸币贬值;同时大量假币流入苏区,扰乱了金融市场。一天晚上,毛泽民伏案工作,不小心披在身上的羊毛衫被火烧着了,这启发了他:制造纸币时掺入一定比重的羊毛,这样既可通过透视纸币的特殊纤维,也可通过火燎纸币发出的羊毛焦味,来辨别钞票的真伪。货币战场上的胜利,为苏区筑起了一道金融防线。

## 扁担上的国家银行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当时国家银行总行工作人员有七八十人,经过动员,只有毛泽民等14人参加长征。长征中,国家银行组成一个大队,编属为十五大队,有100多个运输员,挑着100多副担子,其中有几十担苏区铸造的白洋,几十担票子和一担印票子用的机器、材料等,还有一个连的警卫部队。

这就是“扁担银行”的由来——整个国家银行的资产,就靠着一根根扁担挑着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曲折的长征路上,战斗频繁,缺吃少穿,饥寒交迫,员工们全凭坚强的革命信念支撑努力前进。不幸的是,途中牺牲了6位银行人员。到达陕北时,只剩毛泽民、曹菊如、郭金水、钱希钧、曹根全、任远志、黄亚光和莫韵涛8人。令人惊叹的是,经清点,“扁担银行”的家当尚有黄金2担、白银及银圆12担,另有珠宝若干。核对账目之后发现,除了长征路上的正常开支,竟然没有损失一块银圆。

## “领导干部要带头艰苦奋斗”

毛泽民长期执掌财政大权,廉洁奉公,一尘不染。他常说:“不能乱花一个铜板,领导干部要带头艰苦奋斗。我们是工农管钱,为红军理财的,一定要勤俭节约!”有一次,中共黎川县委书记方志纯,招待省委检查工作的领导吃了一碗米粉肉,到财务报账时,毛泽民坚决不同意,并严肃指出:“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们不能乱花一个铜板,领导干部更要带头艰苦奋斗(国家金库),他对方志纯说:“志纯同志,这笔钱要从你自己的伙食费中报销!”

在毛泽民的率先垂范和严格要求下,国家银行从未发生过贪污盗窃和行贿受贿案件。1943年9月27日,毛泽民被敌人秘密杀害,时年47岁。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为工农管钱,为红军理财”的职责使命。

# 平凡挑夫 无名英雄

□汪行舟



李大爷和宋小盐机智闯过盐哨。(AI制图)

在江西省的最南端有座县城,名曰:定南,在定南县的最东部有个村庄,名曰:兴隆。村中蜿蜒着一条看似普通却意义非凡的山路,它曾是古老的驿道,后来成为关键的盐道,更是一条著名的红色交通线。

中央苏区时期,国民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双管齐下的政策,严禁红色区域与白色区域之间的商品流通,企图使苏区陷入“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蚰蜒蚂蚁之通报”的绝境。

为打破封锁,中国共产党动员边界群众,开辟了一条条秘密通道。1930年前后,粤北、闽西、赣南地区出现了“十万挑夫上赣南”的壮观景象。定南、龙川等地的民众,用肩膀和双脚,以热血与牺牲,踏出了一条条通往中央苏区的生命线。

这些挑夫,多数姓名已湮没于岁月,但他们的壮举如炽热星辰,永远照亮历史的长河。下面讲述的,就是其中三位无名英雄的故事。为了方便称呼,笔者为他们取了化名。

## 少年初涉险途

1931年仲夏的傍晚,铅灰色的云层低压,夕阳挣扎着将最后一点残光泼洒在龟裂的田野上。

少年宋小盐,正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李大爷,走在蜿蜒狭长的山道上。这是他第一次出门“做买卖”——以贩卖牙粉、电筒等日常用品为掩护,从广东海陆丰夹带两三斤食盐,冒险运往瑞金。

干粮早已耗尽,饥饿与疲惫不断侵袭。宋小盐稚嫩的脸上汗水涔涔,干裂的嘴唇如同久旱的土地。

他本想坐下歇息,走在前头的李大爷连忙转身,将一个干瘪的红薯塞进他手里。“小盐,你垫垫肚子,才会有力气。”宋小盐婉拒,李大爷却不由分说,他眸大浑浊的眼睛警惕地扫视四周,压低声音道:“前面就到了哨卡,那有‘白狗子’的盐警,我们小心点。”

听到“白狗子”几个字,宋小盐的手有些不听使唤,不自觉地颤抖起来。就在几天前,与他们同行的伙伴朱西北,在遭遇盐查时,因惊慌逃跑,被子弹击中腿部。他被盐警殴打致死,货物也被没收。那惨烈的画面,至今在宋小盐脑中挥之不去。

李大爷上前仔细地检查了宋小盐的挑山棍——里面中空,藏着食盐。确认无误后,李大爷紧了紧宋小盐扁担上的绳子,安慰道:“小盐,不要害怕,有叔公在。”宋小

盐颤抖着轻声问道:“叔公,‘白狗子’不会发现吧?”李大爷镇静地微笑说:“别怕,跟着我。不管他们说什么、做什么,你都别吭声。”宋小盐不住地点头。

## 智闯江广亭盐哨

李大爷理了理箩筐,然后从地上抓起一把树叶分别洒在两人的箩筐里。两人挑着箩筐,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破旧手电筒的微弱光线在崎岖的山路上跳跃,布谷鸟的叫声忽远忽近。

两人接近江广亭盐哨,蹑脚的脚步声引来了呵斥:“站住!什么人?”“白狗子”盐警立刻用手电筒射过来。

李大爷立刻换上谦卑的笑容,用当地方言答道:“老总,老总,恁地隔壁兴隆嘴(我是隔壁兴隆的)。”盐警持枪上前,粗暴地将箩筐里的货物倒翻一地。“有没有夹带盐?”一个盐警厉声问。

随着盐警手电筒光束的扫射,宋小盐条件反射地屏住呼吸。

李大爷将两包红荷牌香烟递上去。其中一个盐警用手一挡,说:“别来这套,你们有没有夹带盐?”“哎呀,老总,您可别开玩笑,我们只是做点小本生意,怎敢带盐,这这可掉脑袋的啊?”李大爷连忙搭话,“老总,我可不是这条道上的老面孔。”说着,李大爷又将香烟递上。另一个盐警正要查看他们的挑山棍时,从江广亭岗哨传来一个声

音,“诶,听这声音好像是李大爷吧?”李大爷连声应道:“是我,是我,朱站长好,朱站长好!”

安插在江广亭的地下党朱伯群在一个盐警的陪同下,循着光亮快步走了过来。

朱伯群一只手夹着一支烟,一只手插在裤兜里。朱伯群指着那两个检查的盐警说:“箩筐都查了吗?有没有什么发现?”两个盐警异口同声地回答:“没有发现。”朱伯群绕到李大爷后面,故意指着宋小盐问:“这人怎么不说话?”李大爷立即马回话道:“朱站长,他是哑巴,他不会说话。”

“哦……”朱伯群嘴角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长叹一声,很自然地接过李大爷手里的两包香烟,然后手指在烟盒底部轻轻叩了三下,李大爷知道,那是朱伯群在向他发出“安全”的信号。

随后,朱伯群将香烟分给执勤的两个盐警,“没有问题就让他们两个快点滚,我们继续玩牌去。”

## 血染归乡路

有惊无险,李大爷和宋小盐两人快步离开哨卡。眼看家乡兴隆村就在前方,紧绷的心弦刚刚松下,两道黑影却猛地从路旁树林中蹿出!

为首的是个戴黑帽的长官,眼神犀利。他举着手电筒,直射宋小盐的脸:“这

么晚,干什么的?”

李大爷见势不妙,急忙挡在宋小盐的前面说:“长官,我们是兴隆村的。”黑帽子长官瞪大眼睛,“我问他,没问你?”李大爷解释说:“他是哑巴。”黑帽子长官根本不听,用枪口顶住李大爷额头吼:“那你说,你们挑的是什么?是不是贩卖盐、药、布的?”

李大爷连连摆手否认。黑帽子长官又夺过挑山棍掂了掂,“这根棍子是谁的?为什么这么重?”

“我的,我的。”李大爷连忙说,“用久了,汗渍浸的……”

话音未落,黑帽长官抡起竹棍就朝路边石头砸去。咔嚓一声,竹棍弹起,竟未断裂,但内部藏盐的秘密眼看暴露!

电光石火间,李大爷猛扑向前,抓起扁担狠狠向黑帽子长官的后脑砸去,随后又重重地将另一个“白狗子”推进水沟里。他大声喊道:“小盐,快跑!快跑啊!”

宋小盐瞬间惊醒,捡起挑山棍就朝山下冲去,而为了引开“白狗子”,李大爷则朝小水塘方向跑。

由于天黑路小,水塘边坑洼较多,年过六旬的李大爷摔倒多次,很快就被追上。黑帽子长官怒不可遏,拔出手枪……

“砰!砰!砰!”

三声枪响撕裂了寂静。李大爷倒在了血泊中,手中还紧紧攥着一块石头……

正在狂奔的宋小盐,听到了枪声,也听到了一声短促而沉闷的水花响声。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泪水与汗水混在一起,却不敢停下,只是朝着苏区的方向,拼命奔跑。

挫折使人成熟,磨难坚定信念。因为朱西北和李大爷的牺牲,宋小盐最终成功将食盐送到了苏区。此后,他继续奔波在这条充满危险的盐道上,成为“十万挑夫”中坚定的一员。

非常可惜的是,1933年10月,宋小盐也牺牲在从广东返回兴隆的途中,他的挑山棍里,还存着未来得及交付的、雪白的食盐。

如今,定南的一些古老盐道早已湮没在荒草中,但当地老人仍会指着山涧说:月圆之夜,能听见挑夫们的脚步声。那就是当年十万双草鞋,踏过石板路的回响;是无数无名英雄,用生命踩出的、永不消逝的脉搏。

(本文根据《创建中央苏区秘闻》中的“苏区干部关心群众柴米油盐纪事”“苏区干部清正廉洁的故事”等内容改编)

□朱治铭